

现代词学的建立

《词学季刊》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

傅宇斌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词学的建立

《词学季刊》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

傅宇斌 著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傅宇斌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909 - 7

I. ①现… II. ①傅… III. ①词(文学)—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59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词学的建立

《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

傅宇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909 - 7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45.00元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词学史研究（1900—1949）”阶段性成果，由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十二五”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序

张宏生

“现代”一词，内涵丰富，既有时间的概念，又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意蕴，各种说法，难以详述。不过，将“词学”冠以“现代”，应有其特定的指向：一方面，这是将研究领域置于1911—1949年这个时间框架之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一阶段的词学出现了新风貌，具有一些“现代”的特征。提出“现代”，乃是把“前现代”作为参照系。词学这门学问，在词发展的初始阶段，即晚唐五代，就已经产生了，经两宋不断发展，至清代而大盛，至晚清而更有进境。但是，在进入现代之前，词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词话、序跋、评点等形式进行的，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特色，而现代词学的本质，则是将词学放到现代学术的系统中，进行审视。可以说，现在的词学研究者都是从这里获得资源，并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这一段历史，学术界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总结，因此，我很高兴看到傅宇斌《现代词学的建立》一书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

《现代词学的建立》所研究的范围，大致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词学，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20世纪前三十年词学发展之大势，从词社唱和、词人交游、词集刊刻、词学批

评等几个方面加以宏观描述，第二个部分则主要是研究龙榆生先生所主编的《词学季刊》，又尤以对后者所下的功夫为大。

在 20 世纪上半叶，《词学季刊》的出现是一个异数，它不仅是词学领域内唯一的专业性刊物，也是传统文学研究领域内最早的专业性刊物。在这个只存在 3 年，仅出版 11 期的刊物中，龙榆生先生将传统与现代熔于一炉，展示了弘通的气度，开创了崭新的风气，对于词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代词学的建立》对《词学季刊》的各个层面都作了非常细致的考察，特别是从文献学入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比如对《词学季刊》的作者群，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1. 《词学季刊》的作者主要以大学教授为主，同时吸纳了全国各地以及各个阶层的词学家。2. 《词学季刊》的作者之间呈网状结构，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勾连。3. 这些作者由于教育背景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在撰述方式和写作风格上各有差异。4. 这些作者的师承呈现出多样化的情况，以致他们的词学观和论述视角会有细微的区别。5. 《词学季刊》的主要作者为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赵尊岳、张尔田、夏敬观、吴梅、叶恭绰、邵瑞彭、周泳先等十人，基本上就是民国最重要的词学家。这样总结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说明了其作者群的构成，其中也能反映出非常丰富的内涵。比如，同人的性质，使得刊物的凝聚力增强；各方面的差异，见出刊物的兼容并包；吸引最优秀的作者，体现了刊物重要的价值地位。

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 1 卷第 4 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其后，虽然又有学者加以补充，但基本内容仍然不出于

此。在龙榆生看来，前五项前人已经有所经营，后三项则有待于当代学者的努力。这是一个敏锐的见解，特别是关于批评之学，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在论述方式上的本质不同，因此，也就具有开创风气的意义。此后的八十年间，词学批评非常兴盛，成就也非常突出，这与《词学季刊》的倡导分不开。宇斌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同时也指出，在龙榆生所期望的这三个现代所出现的研究领域，除批评之学外，现当代词学家对于其他两项则少有问津，尤其是声调之学，所以，他结合龙榆生本人的创作与理论，重点探讨了龙榆生在声调之学上的贡献。他认为，龙榆生在《填词与选调》中所说的：“必视作者当时所感之情绪奚若，进而取古人所用之曲调，玩索其声情，有与吾心坎所欲言相仿佛者，为悲，为喜，为沈雄激壮，为掩抑凄凉，为哀艳缠绵，为清空萧洒，必也曲中之声情，与吾所欲表达之词情相应，斯为得之。”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一直到现在，仍不失其前沿性。当然，若从发展的观点看，某些方面还有其复杂性。比如龙榆生在分析了《贺新郎》一调的句度、叶韵、声调等之后，指出其“例以入声韵为准，取入声之逼侧，以尽情发泄壮烈之怀抱”。但这一结论放在宋代，或者可能成立，但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那又未必如此了。如清初陆进和顾有年，其所作《贺新郎》就有贺新婚者。这或者是清人不遵法度，或者也可理解为与时俱进。尽管如此，龙榆生提出的声调之学，仍有其特别的价值。犹忆2006年，曾带领从学诸生每天午饭之后讲读唐诗一首，当时我特别向大家推荐赵昌平的《唐诗三百首全解》，认为是注释解说《唐诗三百首》最佳者之一。宇斌显然对此印象深刻，因而在思考诗韵和诗律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时，也特别引用了该书中昌平兄的数段论述。最近，我在拜读葛晓音教授的大著《先秦汉魏六朝

诗歌体式研究》时，注意到昌平兄为葛著所撰写的序言。他在称赞了葛教授以诗体形成与演变为主线，以节律为主要切入点而对先唐诗歌体式生成及体调演进所做的出色研究后，又举唐代若干音调谐美之诗和节律拗峭之句为例，指出“能真切地感到其声韵节律对于其诗歌意境表达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感到诗人在选韵调声时肯定有创造性的综合运用”。我们也不妨将相似的视角引入词的领域来加以思考。词本就与音乐关系密切，虽然南宋以来，情形有变，宋代以后，词乐渐亡，因而从唐音到宋调，乃至后来的明清词，都颇有差别，但从声调的角度进行研究，仍然是说明其美感特征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这方面，龙榆生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而现在各方面的条件更加充分，我们有理由期待更为深入的研究出现。

关于“现代”的概念，宇斌在著作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他指出，旧体诗词创作在民国并不寂寞，不仅不寂寞，甚至可以和新文学平分天下。《词学季刊》非常关心当代词史和当代词风的建设，不仅每期刊载时人词作，囊括了民国时大部分重要的词人，同时，通过这一词学阵地呼吁改革词风。这里事实上提出的是如何为旧体诗词创作定位的问题。为了说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创作的兴盛，作者仍然是先从文献学出发，指出民国以来刊载旧体诗词的报刊不下数百种，而从1919年至1949年，刊登旧体诗词的重要报刊凡40种，政界作者纷纷加入，学者型作者更成为主力，“说明旧体诗词的创作在民国拥有广泛的市场，各方面的接受表明它也是参与当代文学建设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他所进行的思考是旧体诗词与当代文学建设之间的关系，暗含着的提问是，旧体诗词是不是属于“当代文学”？或旧体诗词是不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如果说，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划分是文体之分、语

言之分，则旧体诗词当然不属于新文学。但这个概念如何界定？显然，在1919年之前，中国也有所谓的白话小说或者白话诗，那么，应该将其划在什么范畴？还是说，只是看其白话的程度？而白话的程度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说，语言不是二者互相区别的关键，还是应该看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则旧体诗词似乎又应该放在“当代文学”之列，因为这些作品正是当代人所写，而且，表达的也是当代人的某些思想和感情。这个定位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旧体诗词创作的尴尬：它为当代人所写，却又似乎并不为当代文学史所接纳。莫非，只能在类似《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中才能处理这个问题？这确实比较棘手，但宇斌将它提出来了，至少是希望说明，文学史的书写应该具有更为多元的思考角度。

所以，无论是从传播学的研究角度，还是文献学的实证方式，以及在文献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分析，都能看出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深度。相信这部《现代词学的建立》的出版，定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博士毕业之后，宇斌负笈南下，前往云南工作，虽然相距遥远，但师生之间仍然论学不辍。宇斌目前的地理位置相对边缘，但所谓边缘和中心也是相对的，当年西南联大曾经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绽放出奇葩，足以说明事在人为，存乎一心，相信宇斌也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2012年10月于香港将军澳中心之片翠山房

目 录

导 言	1
一 现代词学之界定与分期	1
二 本书须解决之问题与研究之方法	13
第一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和文学	15
第一节 国故运动与现代学术的成熟	17
第二节 传播学视野下的民国旧体文学	26
第二章 1900—1930 年代中国词学的发展	41
第一节 词社唱和	43
第二节 词人交游	55
第三节 词集刊刻	60
第四节 词学批评	69
第三章 《词学季刊》的创办与 1930 年代词学圈	83
第一节 龙榆生和民国词坛	83
第二节 《词学季刊》的宗旨、体例与发行	89
第三节 《词学季刊》的撰述群体	94
第四节 《词学季刊》词人群	106

第四章	《词学季刊》之目录之学	115
第一节	宋元以来的词学目录学	118
第二节	赵尊岳词学目录学的贡献	129
第三节	唐圭璋的辑考之学	141
第四节	夏承焘的词人年谱之学	146
第五章	《词学季刊》之声调之学	153
第一节	历代词律之学研究述略	154
第二节	《词学季刊》中的词律之学	170
第三节	龙榆生的声调之学	178
第六章	《词学季刊》之批评之学	197
第一节	传统的词话批评及其新变	198
第二节	龙榆生的词学批评	208
第三节	其他现代词学家的词学批评	217
第七章	《词学季刊》之嗣响	227
第一节	1937—1949年中国词学概述	228

第二节 《同声月刊》词人群及其旨趣.....	244
第三节 《同声月刊》的词学成就与词学史意义	259
余 论	271
附 录 :《词学季刊》词人小传.....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11

导 言

一 现代词学之界定与分期

现代词学的研究，在词学界尚是开创性的研究课题，已有学者在尝试构建现代词学的图景。刘扬忠先生较早地认识到研究现代词学史的重要性，他在《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后文简称《论纲》）一文中提出：“中华词学这门学问虽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但学科性质和范围确定得比较晚，科学的、现代化的研究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词学本体理论的建构更是直至今日还显得不够充分、不够完整和不够系统（相对于其他人文科学部门来说）。要改变词学研究相对落后的现状，找到学科发展的突破口和新起点，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总结 and 撰写词学学术史，来实现理论的升华和超越。这部学术史的撰写，理应分为古代（十世纪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大阶段，而以二十世纪作为重点。”^①他的这种认识可谓是得风气之先的。中国的现代学术最大的特点便是利用了西方的科学方法，恪守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因而能在前人基础上有空前的创获。总结现代学术的成就，对于当代学术必有极大的启迪。词学作为独立的研究

^① 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上篇）》，《暨南学报》2000年第6期。

对象，也正是在现代学术兴起的潮流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现代词学的内容、性质、时段、意义作个厘析。

（一）学术界对现代词学界定及分期的认识

刘扬忠先生在《论纲》一文中将百年来的现代词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1901—1930年，为词学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酝酿期；二、1931—1949年，为现代词学初具规模、词学研究现代科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时期；三、1950—1978年，为词学研究先是持续有所发展，后因政治文化的强力干预而陷入困境的时期；四、1979—2000年，为词学研究获得新生，空前繁荣并趋向多元化的时期。”这个分期自有他的合理处，然而，其问题在于这种分期与他所说的“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与整个古典文学界的变化同步”并不吻合。中国的现代学术发端于清末民初，而提出和确立则在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可以说，自1919年后，真正的现代学术已经展现了。此期，随着问题与主义之争，国故运动的发展，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已经较普遍地采用现代研究方法了。即就词学研究而言，在1919—1930年间，已经有大量的词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且不少均吸收并运用现代学术理念，论文如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胡先骕《评朱古微疆村乐府》（1922）、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1923）、李万育《说词》（1923）、郑振铎《李后主词》、《纳兰容若》、《碧鸡漫志》（1923）、冯沅君《玉田朋辈考初稿》（1926）、孟诗根《关于樵歌》（1927）、台静农《宋初词人》、张友仁《论北宋慢词》、滕固《纳兰容若》、郑振铎《宋人词话》（以上1927）、施蛰存《李清照词的标点》（1928）、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1930）、

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摄影》(1930)等等^①。所以,如果为现代词学分期,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参照,1919年自可以作为一个转折点,而不必延后。

施议对先生在《百年词学通论》中高标义帜,截断众流,提出建设“中国词学学”的构想^②,并以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为起点,将百年词学分成开拓期(约1908—1919)、创造期(1919—1949)、蜕变期(1949年迄今)三个阶段。这一见解无疑振聋发聩,启人良多。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词学发展的大关键、大起落尤有裨益。稍感缺憾的是,词学发展之“渐”似非施先生所注意。如果考虑到1933年《词学季刊》创刊前后词学之不同的话,1933年无疑是其中关键所在。

曹辛华在其《20世纪词学研究的“现代化”特色》一文中也为20世纪词学作了一个分期,他以词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为依据将20世纪词学分为1949年前、1949—1979年、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③。这种分期方法总的说来注意到了新中国30年词学批评的相对僵化、凝滞的特点,但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几年的词学走向缺乏细腻的分析,对民国迄1949年以来的方法延续性也把握得不够。

其他学者如杨海明、胡明、王兆鹏等先生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对现代词学的发展变迁各作了独到的分析^④。他们一致肯定的是现代词学中第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当属王国维。正如方智范等编

① 以上材料分别见于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重民、徐昌绪等编《国学论文索引》,中华图书馆协会1919—1952年版。

② 施议对:《百年词学通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③ 参见曹辛华《20世纪词学研究的“现代化”特色》,《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④ 参见杨海明《词学理论与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王兆鹏《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中所说：“《人间词话》既不同于诸多将作法与赏析相结合，侧重于具体艺术的传统词话，也不同于侧重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相结合，以提高词的意格、品位等的诸多论著。它超越了传统的‘知人论世’的道德评判及社会学批评这一层次，又非仅停留于艺术鉴赏、探求法度的旧有传统，而是将词学批评推上了美学、艺术哲学的新层次。”^①也许正因为词学理论家更容易接纳感性的体悟，因而有时不免忽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谢桃坊先生则注意到了梁启超在中国词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开辟作用：“梁启超在我国新旧文化思想交替之际，第一个在严格意义上以社会批评方式来探讨宋词的社会意义，一反传统的偏见，高度评价了辛弃疾及宋代豪放词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开启了现代词学的社会批评倾向。他关于作品的分析，完全摆脱了旧的词话和评点的形式，而能从政治的与历史的，或心理的与文学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尤其体现出一种新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他吸收了西方科学的实证方法，继承了清代考据学优长，使词学研究脱离了旧的考据模式，使词学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研究。梁启超虽然不是专门的词学家，其词学研究却为现代词学开辟了一条新路。”^②梁启超的现代词学批评最早见于他的《饮冰室诗话》中，此后梁令娴将其中论词之语辑为《饮冰室词话》，收入《艺蘅馆词选》中，《词选》刻于1908年，而《饮冰室诗话》则在1902年即连载于《新民丛报》^③，所以谢桃坊先生所说应为确论。刘扬忠先生也注意到梁启超的词学贡献，但由于对梁氏词学活动的失察，

① 方智范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②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修订本），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460页。

③ 参见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认为梁氏“在词学上仅仅成为第二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①，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注意到梁启超作为现代词学奠基人的作用，但仍认为“在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换过程中，能比较全面、系统地运用西方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来研究中国词学，使中国传统词学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第一人，非王国维莫属”^②。王国维的词学贡献自比梁启超为多，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最大价值并非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人间词话》的西方理论渊源恰在于尼采的反科学和反理性，其贡献在于提倡文艺的独立性和悲剧观。

（二）现代、现代性与现代词学

那么，我们如何界定现代词学以及如何为其分期呢？逯耀东先生说过：“讨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运动驱使下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又说：“民族运动的掀起，民族情绪的抒发，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但外来刺激如果没有遇上本土学术的波动，不过是一池春水中的涟漪，是无法掀起滔天巨浪的。事实上，作为中国学术主体的传统经学，依附政治长久发展以后，到晚清已遭遇困境而步入穷途，不仅开始松动，且已在结构解体中挣扎，完全失去其原有的绝对权威地位。于是原来在其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颖而出，争取平等的对待与地位。”^③实际上，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和中国的现代

① 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上篇）》。

② 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③ 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